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秦观贬谪词研究

王思雨

(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本文基于文学地理学理论，以空间动态分布为视角，考察北宋词人秦观贬谪期间词作的地理书写特征及其心态演变。通过分析其贬谪行迹与吴越、荆楚、岭南三大文学区的关联，揭示地域环境对其词风与情感表达的深刻影响。在吴越时期，词作多追忆汴京繁华，呈现华丽化书写；荆楚阶段转向自然意象与凄婉风格，融入桃源传说与楚地民俗；岭南时期则因气候与人文差异，趋于清淡化叙事。研究进一步探讨词中人造空间与自然空间的意象运用，折射出秦观心态从怅惘、凄厉至绝望的沉沦过程。从空间视角对秦观贬谪词进行审视，会对地域与词风、词作的关系形成新的认识。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秦观；贬谪词；空间书写

收稿日期：2026 年 8 月 15 日　　**中图分类号：**I222

通讯作者：王思雨，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A Study of Qin Guan’s Ci Poems Written During His Exi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Geography

Siyu W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iterary geography and adopting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spatial distribu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sychological evolution in the Ci poetry of Qin Guan, a Northern Song Ci poet, during his period of exile. By analyz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is exile journey and the three major literary regions—Wu-Yue, Jingchu, and Lingnan—this study reveals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on his poetic style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During his time in Wu-Yue, his Ci poems often reminisced about the splendor of Bianjing, presenting a lavish style of writing; in the Jingchu phase, he shifted toward natural imagery and a melancholic style, incorporating the legend of the Peach Blossom Spring and the folk customs of the Chu region; while in the Lingnan period, due to differences in climate and culture, his narratives tended toward a more subdued and understated style. This study further explores the use of imagery depicting both man-made and natural spaces in his Ci poems, reflecting the descent of Qin Guan’s state of mind from melancholy and anguish to despair. Examining Qin Guan’s Ci poems written during his exile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offers new insight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graphy, poetic style, and the works themselves.

Keywords: Literary geography; Qin Guan; Ci poems written during exile

一、词作地理空间分布与书写转向

诗作所呈现的空间动态分布是文人及其作品在不同时间、地点的具体表现。同时，诗歌文本内容的时间、地点、环境等时空因素能更清晰地

体现文人生平活动行迹及地理环境对于诗人创作的影响[1]。曾大兴认为：“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有两种状态，一种是静态分布，一种是动态分布。静态分布即其出生成长之地的分布，动态分布即其流寓迁徙之地的分布[2]。”古代官员贬谪属于动态地理分布。不同任所的地域环境及生活经历不但能影响诗人心境，也对拓宽创作题材具有重大作用。不同于苏轼词的乐观放达、黄庭坚词的坚韧、晁补之词的内敛沉郁，秦观贬谪词具有悲观绝望之感，并且随着贬谪地的不断南迁更加重了这种情感。同时，秦观贬谪词中的空间元素十分密集且突出，对于空间的运用不仅契合自身心态的变化，也与贬谪地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相符。秦观贬谪词产生于其近十年的贬谪生活中，以空间动态迁移为轴线，秦观的心路历程和地理书写在词中得到充分体现。

（一）贬谪行迹与地理要素

秦观的贬谪是一种长时段的动态分布。“绍圣初，坐党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刘拯论其增损实录，贬监处州酒税。使者承风望指，候伺过失，既而无所得，则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继编管横州，又徙雷州[3]。”这一路上秦观创作了很多词作（见表 1）。依据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中关于中国文学地理分区的理论框架。曾大兴以历史地理与文化地理的综合视角，将中国古代文学的地理分布划分为若干文学区，其中吴越文学区大致涵盖今江苏南部、浙江及安徽部分地区，荆楚文学区约当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范围，岭南地区的范围指今广东、广西以及福建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秦观籍贯高邮属广义的江淮—吴越文化圈，其绍圣贬谪地杭州、处州属吴越文学区，郴州和衡州属于荆楚文学区，横州和雷州属于岭南文学区。通过对贬谪地的动态分析可以发现，秦观的贬谪词书写与当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貌有重要关联，是在每个文学区所产生的独特创作。

表 1　秦观贬谪期间词作及文学地理归属

贬谪地	贬谪词
杭州	《望海潮·洛阳怀古》《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风流子·东风吹碧草》《虞美人·高城望断尘如雾》
处州	《千秋岁·水边沙外》《好事近·春路雨添花》
郴州	《临江仙·千里潇湘挼蓝浦》《如梦令·遥夜沉沉如水》《阮郎归·湘天风雨破寒初》《踏莎行·郴州旅舍》《点绛唇·醉漾轻舟》《鼓笛慢·乱花丛里曾携手》《如梦令·池上春归何处》《满庭芳·碧水惊秋》
横州	《如梦令·楼外残阳红满》《醉乡春·唤起一声人悄》
雷州	《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

注：本表系年主要依据周义敢《秦观集编年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年）。其中《满庭芳·碧水惊秋》系于绍圣四年（1097）秋郴州贬所，属荆楚文学区；《醉乡春·唤起一声人悄》系于元符元年（1098）春横州贬所，属岭南文学区。《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系于绍圣元年三月秦观出为杭州通判、离京之际，据词中“飞絮落花时候”与离京时令相合推定。

（二）吴越文学区与华丽化书写

吴越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先进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吴越地区作为南方国都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南京和杭州等历史国都分布于此，与北方中原—关东地区遥相呼应，再结合吴越地区地势低平、山势平缓、河流密布、气候湿润等地理因素，其文学作品总体上呈现出风格秀丽与语言华丽的特征。秦观籍贯扬州高邮，在文学地理分区中属吴越文学区。吴越地区的山水和浓厚的国都人文传统也让秦观贬谪词作受到熏陶。秦观贬谪吴越期间所作词篇，多以追忆汴京往昔生活为核心主题，集中表现出对旧日都城繁华与交游场景的深切怀念。例如：

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望海潮》）

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望海潮》）

多情，行乐处，珠钿翠盖，玉辔红缨。渐酒空金榼，花困蓬瀛。（《满庭芳》）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千秋岁》）

在这些词作中，秦观不仅用金谷园和铜驼路的“俊游”指代汴梁时期与同僚们在金明池和琼

林苑畅游，也借西园写出了西池中繁华热闹的集会：各种华丽灯饰掩盖了明月的光辉；精心装饰的车辆相互拥挤，擦损了路边的花枝；鲜红的桥梁上人来人往，诉说着今日的趣事。秦观在这一时期的贬谪词主要描写昔日汴梁时期的奢华物饰和生活，反映出为数不多的华丽化倾向[4]。词人之所以在吴越之地反复书写对汴京奢华生活的追忆，一方面是由于吴越本身亦为历史上的帝都兴衰之地，空间与文化上的相近性极易引发词人对开封繁华的联想与对比；另一方面，此时秦观甫遭贬谪，在地理上仍与都城开封保持较近的距离，心理上尚存重返朝廷、再预朝事的期待。因而，这一阶段的词作不仅是对旧日生活的回忆，更暗含对政治中心与权力生活的向往和渴望，映射出词人在特定贬谪初期的复杂心态。这一情感与地理的双重维度，共同构成了秦观词中独具特色的“吴越记忆”。

（三）荆楚文学区与自然化书写

相比于吴越时期的华丽，荆楚时期的贬谪词则逐渐回归本原，呈现出更多的自然意象。荆楚地区的界定在《荆楚文化志》中有详细记载，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范围[5]。荆楚文化区的自然环境有三大地理特点：一是水网密布，河湖众多；二是山脉高耸且数量多；三是气候湿润，雨水众多。秦观贬谪词中出现荆楚元素较多，除了有被贬谪地本来就是荆楚地区的郴州和衡州之外，还跟本地区有“信巫鬼，重淫祀”的民风民俗以及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有关[6]。在秦观的词作中，“桃源”始终被描绘为一处充满理想与希望的精神栖居之所。例如《满庭芳·碧水惊秋》中“问篱边黄菊，知为谁开”一句，实为化用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典故，显示出对隐逸闲适生活的向往。而《踏莎行·郴州旅舍》中“桃源望断无寻处”，《点绛唇·醉漾轻舟》中“苦恨东流水，桃源路、欲回双桨”，则透露出词人虽心向桃源，却求之不得、屡屡失望的怅惘情绪。值得注意的是，“桃源”这一意象本身发源于荆楚地区的湖南常德，秦观在贬谪郴州期间运用这一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景观，既贴合其自身失落与希冀交织的心境，也为其词作注入了鲜明的荆楚自然与文化元素。值得注意的是，“桃源”这一意象本身发源于荆楚地区的湖南常德，秦观在贬谪期间运用这一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景观，既贴合其自身失落与希冀交织的心境，也为其词作注入了鲜明的荆楚自然与文化元素，从而增强了词境的地域感和真实感。

除了“桃源”之外，还有其他的荆楚元素：如《临江仙·千里潇湘挼蓝浦》中用“兰桡”指代曾经经过湘江的屈原，“妃瑟”指代湘夫人。此外，荆楚地区的自然气候与地理环境也成为其重要的书写对象，例如：“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阮郎归》）此句以衡阳与郴阳的地理差异为背景，借“雁无书”暗喻自身音信断绝、孤悬南荒的处境，既写出荆楚以南山川阻隔的真实地貌，也折射出词人内心的孤独与迷茫。“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踏莎行》）该句如实描绘了郴江绕行郴山而后北流汇入潇湘的自然水势，词人以江河的奔流反诘其归宿，暗喻自身宦途漂泊、不知所归的命运，地理特征与人生感慨融为一体。“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踏莎行》）这两句生动写出荆楚地区夜晚多雾的气候特点，雾霭笼罩楼台、月色模糊渡口，不仅真实再现了南方潮湿朦胧的夜景，更象征了词人前途渺茫、理想难寻的心理状态。秦观在这些词中，不仅客观再现了荆楚一带独特的地理风貌与气候特征，更将自然景象与自身贬谪中的苦闷情绪、仕途失意的哀伤紧密结合，使其词风在地域色彩的映衬下，更具深沉的感染力[7]。此时的“自然”，既指其语言风格逐渐褪去华彩、转向素朴真淳，也体现为对自然意象更为频繁与娴熟的运用，最终形成其贬谪荆楚时期特有的凄婉清峻之词风。

（四）岭南文学区与清淡化书写

岭南地区的范围指今广东、广西以及福建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8]。明人苏浚《气候论》引李西美《广南摄生方论》云：“四时常花，三冬不雪，春夏雨淫。”又引谚语：“四时皆似夏，一雨便成冬。”对岭南气候作了生动总结，并说明岭南地区气候季相的不明显。所谓季相，曾大兴解释为“植物在不同季节的表象”。季相通过当地的植物最先反映出来，但是在岭南地区的植物一年四季并无明显变化，所以季节变化不明显，因此“伤春悲秋”的传统文学观念不够突出。在这种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下，秦观这一时期贬谪词的情绪

波动也不明显：《醉乡春·唤起一声人悄》写“衾冷梦寒初觉”“窗外月华霜重”，听觉、触觉皆冷，却以“醉乡广大人间小”作平淡收束；至《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春雷州重逢亦只归于“无限事，不言中”。可见此时词人心境已由凄厉转向麻木，景物虽在，而抒情触发机制已钝。无论是“醉乡广大人间小”的平淡陈述，还是“无限事，不言中”的沉默收束，都体现出情感表达的节制与内敛。

二、秦观贬谪词中的空间类型及文学景观

秦观贬谪词中的空间书写类型丰富、层次分明，总体上可划分为人造空间与自然空间两大类别[9]。人造空间主要包括宫室、园林和城市景观，这些建筑与场所往往承载着词人对往昔京华生活的记忆与想象；而自然空间则以水体意象为核心，如江、河、湖、海等，反映出他在流离途中对自然环境的敏锐感知与情感投射。对不同类型的空间选择与修辞处理，实则折射出秦观在不同贬谪阶段的心态变迁。早期词作中常见金谷、铜驼、西园等典雅富丽的人造意象，映射出其尚未泯灭的仕途期待与都城情结；而后期尤其在荆楚、岭南时期，则更多借助郴江、潇湘、雾月津渡等苍茫幽渺的自然空间，传达其逐日深沉的孤寂与幻灭之感。

进一步来说，这些地理空间在秦观的词笔下并未止于物理意义的存在，而是经由其文学化的凝练与重构，升华为具有强烈抒情功能和象征意蕴的“文学景观”。它们既源于词人身处之地的真实自然地理风貌，又融入了其主观情感与生命体验，从而成为某种心路历程的载体与记忆的保存形式[10]。这种将地理空间转化为诗性空间的艺术手法，不仅增强了词作的地域特色与情感深度，也体现出秦观在贬谪生涯中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持续思考与文学表达。

（一）人造空间

秦观的贬谪词中广泛运用了多样的人造空间意象，这些意象既包括整体性建筑形态，如“楼”“城”；也包括建筑内部的空间构成，如“闺”“房”；以及具有连接或阻隔功能的建筑部件，如“阶”“门”[11]。此外，还涉及园林景观（如“庭院”）和具象的城市地名（如“衡阳”）。尽管其中部分空间样式为宋词常见意象，秦观仍能将其巧妙融入自我独特的艺术表达之中。通过系统梳理可发现，这些空间意象的运用主要体现为两种情感指向：其一为对往昔时光的追忆与怀旧。例如，自汴京贬往杭州途中，他以洛阳“金谷”“铜驼”等名胜寄寓对京师旧游的眷恋，实则是借古喻今，婉转表达对汴京盛景的怀念与对再遭贬谪的隐忧；其二则是对当下贬所环境的客观摹写中注入主观情绪，如处州所作“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本为寻常春景，却因词人内心郁结而显得纷乱凄迷。

无论是对过去的回溯还是对现实的书写，秦观皆通过直接描写与间接对比两类手法，以建筑空间为媒介，折射其在贬谪生涯中所承受的精神困境。在空间形色描写方面，亦体现出显著的情感倾向[12]。颜色词如“青”“朱”“玉”“苍”“金”等多用于描绘都城记忆中的华丽建筑，符合宋代宫苑建筑的实况，也承载着词人对往昔的理想化想象；而在描写贬所空间时，则常用“空”“寒”等语，虽与当地气候季节有关，更深刻反映出其孤寂凄凉的心理状态。由此可见，秦观在词中构建了两类鲜明的空间意象体系：一类以“朱桥”“玉楼”“兰苑”为代表，色彩明丽、结构精巧，用以象征汴京时期的美好生活；另一类则以“孤馆”“空阶”为典型，笼罩在冷寂与疏离的氛围中，且随贬地日益偏远，词中空间的孤寒感与词人心态的沉沦程度呈加深之势。空间因此成为秦观心态变迁的重要载体，其形与色的差异直观传递出或悲或喜的情感内容。这不仅体现出词人细腻高超的空间感知与艺术表现能力，以“唯美的人生态度把玩现在”，更使其词作在情感表达上呈现出清晰可辨的阶段性特征。

（二）自然空间

在秦观的贬谪词中，自然空间意象丰富多样，其中以水域类意象尤为突出。以周义敢《秦观集编年校注》所收表 1 词作为范围，逐篇检索可见，秦观贬谪词最密集的水体词为“水”“江”“流 / 流水”，另有“海”“溪”“津”“池”等。若严格统计字频，应将词牌、词题、序跋剔除，并列明重复计数与异文；在未附统计表前，本文只作意象类型分析，不作精确字频断言。除“溪”“津”“池”“流”等多用于标示实际创作地点外，其余水体意象常被词人用以寄托与渲染愁绪。例如，“水”常与

“暗”“空”“无情”“沉”“苦恨”等情感化修饰语相连，使其由自然之物转化为具备情感张力的意象。同样，“江”与“波”本为流动之水，在秦观笔下却多呈凝滞、冷漠之态，如“争奈无情江水、不西流”“微波澄不动，冷浸一天星”，生动传达出词人内心的孤寂与无力感。此类描写既契合其贬谪地水网密布的地理特征，也与其词风中的委婉含蓄、善用留白的美学倾向相呼应。此外，水的流向亦被秦观赋予深刻的隐喻意义。“暗随流水到天涯”“苦恨东流水，桃源路，欲回双桨”等句，借水流的方向性与不可逆性，映射出词人对理想彼岸的向往与现实困顿之间的强烈张力。而“海”这一意象则以其浩瀚无边的视觉特征，成为词人无以排遣之愁苦的极致象征，无论是平静或是波澜起伏，皆暗示其内心深广的忧思。与苏轼笔下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豪迈之水以及黄庭坚《满庭芳》：“风清夜，横塘月满，水净见移星”中的澄澈静水不同，秦观词中的水体始终笼罩在落寞与哀愁之中，这一特点既与其哀婉敏感的心性密切相关，也与其常于夜间静观水域时所生的孤独体验有关。从空间书写的整体演变来看，秦观在贬谪初期（吴越时期）多借繁华精巧的建筑空间传递怀旧之情与华丽文风；随着南贬愈深，其心态由怅惘转为绝望，词中建筑意象渐趋清冷，而南方自然景观尤其是水体意象的比重大幅上升，书写风格也转向自然清淡，体现出其心态与词风在空间选择与情感投射上的深层互动[13]。

三、秦观贬谪词中的心态变化

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中，曾大兴提出了文学地理空间构建的四种基本模式：其一为“寒江独钓型”（单一空间、单一时间）；其二为“重九登高型”（不同空间、同一时间）；其三为“西窗剪烛型”（不同空间、不同时间）；其四为“人面桃花型”（同一空间、不同时间）[2]172。这四种模式通过时间与空间维度的不同组合，构建出多样的叙事与抒情框架。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可清晰辨识秦观在不同贬谪阶段的心态变迁与其词作空间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

在吴越文学区时期，秦观的贬谪词以“人面桃花型”与“西窗剪烛型”为主要构建方式。《望海潮·洛阳怀古》中，词人借洛阳金谷、铜驼等典故，指代汴京金明池、琼林苑的往昔游宴，在汴京与洛阳的双重地理记忆中展开今昔对比，抒写对往昔生活的追忆与政治失意的慨叹；《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通过汴京当下杨柳与昔日“碧野朱桥”的并置，形成时空交错下的强烈情绪反差；《风流子·东风吹碧草》则以扬州当前春色与汴京旧事的联系，传递出深切的愁思。这一阶段，秦观频繁运用异地或异时的对比手法，其愁绪中仍隐含重返京城的期待。由于地理距离并未过于遥远，词作中反复出现的都城意象，既映射出其对政治中心的眷恋，也反映出彼时心态虽忧悒却仍未完全绝望。

而当秦观再度南贬，进入荆楚与岭南地区时，其心态发生显著变化，词中空间结构也转向以“寒江独钓型”为主导。这一时期，对都城的追忆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对贬谪处境的真切书写与绝望情绪的直抒。如荆楚时期所作《如梦令·遥夜沉沉如水》，聚焦于驿馆寒夜，主观渲染郴州冬夜的凄冷，实为词人内心荒凉的外化；《踏莎行·郴州旅舍》亦以孤馆迷茫、江流诘天的意象，发出对命运不公的悲愤质问。至荆楚郴州时期，《满庭芳·碧水惊秋》虽写南国秋景，却尽是以酒难消之宦愁，冷色视觉意象成为基调，反映出其心态已由凄厉转向深沉的内敛。至岭南时期，《醉乡春·唤起一声人悄》写横州春日海棠花开，词人却只作客观景物描写，情绪波动微弱，折射出其心态已趋于幻灭。元符三年遇赦北迁前夕，苏轼自海南赦还，过雷州与秦观相会；秦观作《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写“偶相逢，惨愁容”“无限事，不言中”。此时二人已非少年交游，而是历尽迁谪后的衰翁重逢，词中重逢之喜甚薄、死生契阔之痛甚深，故“不言中”较郴州、横州时期的凄厉追问更进一层，近于劫后余生的沉默。

尽管荆楚与岭南两阶段皆呈悲观走向，心态层次仍有差异：荆楚之贬出于意外，词中突出冬季萧瑟，情感更显凄厉；岭南时期则已是终局之贬，即便春色如许，亦只能借酒麻木，尽显绝望。心态随地理变迁而逐步沉沦，由此可鉴。

四、结语

本文从文学地理学视角出发，以空间动态分布为轴线，考察了秦观贬谪词在吴越、荆楚、岭

南三大文学区的书写特征与心态演变。研究表明，秦观贬谪词的空间书写经历了从“人造空间主导”到“自然空间主导”的转变：吴越时期以金谷、铜驼、西园等建筑意象承载对汴京生活的追忆，书写中仍隐含重返政治中心的期待，词风偏于华丽；荆楚时期转向水体、雾月、桃源等自然意象，以凄婉清峻之笔传达贬谪途中的苦闷与孤独，心态由怅惘转向凄厉；岭南时期则以清淡之笔书写南国风物，情感表达趋于内敛与节制，心态走向幻灭与麻木。空间书写成为秦观心态变迁的重要载体，其形与色的差异直观传递出词人情感从眷恋、凄厉到幻灭的阶段性变化。

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视角审视秦观贬谪词，可以发现其词中的空间元素并非单纯的背景铺陈，而是与词人心态、词风转变形成了深层互动。吴越时期的“人面桃花型”与“西窗剪烛型”空间结构，在时空交错中展开今昔对比，愁绪中仍存重返之望；荆楚以降的“寒江独钓型”空间结构，则以单一时空的即景写实，将冷寂的自然空间与凄厉绝望的心境融为一体。空间书写重心的南移，与词中情感触发方式由“追忆触发”转向“即景触发”、由外放凄厉转向内敛麻木，共同构成秦观贬谪词地理书写的阶段性图景，也印证了文学地理学关于地理环境与文学创作互动关系的基本理论。

参考文献：

［1］王正刚，谢晓娟 .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杜牧四任刺史时期诗歌研究［J］.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25,45(04):73–80.

［2］曾大兴 . 文学地理学概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3］［元］脱脱，等 . 宋史：第 37 册，卷四百四十四 文苑六 秦观传［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13113.

［4］周义敢，程自信，周雷 . 秦观集编年校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5］张正明，刘玉堂 . 荆楚文化志［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3.

［6］班固 .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1666.

［7］汪森 . 粤西文载校点［M］. 莫乃群校点 .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229.

［8］徐培均 . 淮海集笺注（修订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3.

［9］杨世明 . 秦观词笺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21.

［10］宗白华 . 艺境［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89.

［11］董晋豪，程建虎 . 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秦观词探析［J］. 今古文创 ,2024（24）:44–46.

［12］徐培均 . 秦少游年谱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13］曾大兴 .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J］. 人文杂志 ,2016（5）.

作者简介：王思雨 (2001–)，女，汉族，陕西咸阳人，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方向为古代文学。